蒙、藏文文献中顾实汗入藏记载的考辩

罗　布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入藏，是清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汉文史籍却鲜有记载，蒙、藏文文献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一问题的珍贵史料。

首先，关于顾实汗入藏的历史背景。通过蒙、藏文文献，我们可以看到：

宗喀巴创建的格鲁派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到十七世纪初叶时，影响所及，上至阿里三围，下及多康六岗。尤其是在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时将黄教传播到蒙古地区并与土默特蒙古势力组成比较稳定的福田—施主关系以来，形成了比较强大的格鲁派寺院集团势力。黄教势力的蒸蒸日上，必然会影响到其它教派属区封建势力的利益，从而引起其它教派的敌视与打击，特别是被明王朝封为“领天下释教”的“大宝法王”并授权其在藏委派僧俗官员①的噶玛噶举派的强烈反对，他们极尽所能，甚至于不惜以草拟宣传基督教的敕文为代价来讨好藏巴汗，以图求得藏巴汗的支持去战胜格鲁派。②同时，格鲁派与蒙古势力的联结，尤其是身为蒙古人的四世达赖进藏登上哲蚌寺甘丹颇章宝座以后，蒙古王公接连不断地以朝拜达赖喇嘛为名带兵进驻西藏，并与第巴吉雪巴等联合攻扰藏地，引起了势力日盛的藏巴第悉之不满和反对；此外，经过一番矛盾争执而寻认的五世达赖喇嘛又恰好出身于因其在关键时刻疏离藏巴汗而去投奔古热瓦势力、从而与藏巴第悉结有素怨的琼结巴家族，③致使在藏巴第悉跟格鲁派集团的关系方面又多了一层阴影。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初，素为格鲁派依靠的土默特蒙古为喀尔喀却土汗所灭。却土汗诡称他“对于各教派不会偏袒”，“又从在该地的萨迦派、主巴噶举派、噶玛噶举派僧人及噶玛巴红帽绕降巴处听了许多秘法”，还请格鲁派的第巴曲杰到青海湖畔，表示极为喜悦，但却对他说：“看到喇嘛您，虽使我产生信仰，但一见这种帽子，使我心中火起。”④实际上，“他对于佛教，特别是对于宗喀巴大师的教法，生起邪见和怒恨，而恶意破坏”⑤，并成功地把原信格鲁派的林丹汗吸引到自己的反格鲁派一方来，“林丹汗想危害格鲁派，但行至夏拉塔拉死去。”⑥1635 年，却土汗父子与噶玛噶举派红帽绕降巴等会商，决定“同藏巴汗同心协力，彻底消除格鲁派”。⑦与此同时，康区的白利土司顿郁多吉占领了德格、昌都、类乌齐等地，“对佛教徒进行残害，而只许发展苯教”⑧，摧毁了在康区的大部分萨迦、格鲁、宁玛三派寺院，并逮捕监禁了佛教僧人。

总之，格鲁派在西藏本地失去了传统的支持者帕竹家族而受到噶玛噶举等其它教派和藏巴汗势力的抵制和反对，在外又失去了传统的依靠力量土默特蒙古，被“察哈尔人、却土汗、白利土司等阻断了汉藏黄金桥”⑨，使格鲁派集团陷入了内外交困、四面楚歌之中。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格鲁派集团决策人物才作出决定，向驻牧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求援，并得到和硕特部顾实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其次，有关这一事件的历史记载，多引自五世达赖于甘丹颇章政权建立的第二年受顾实汗之请而写的《西藏王臣史》：

喀尔喀却土汗被驱逐出了本土，而来到措喀地方。这真象那故事中所说的罪恶地区降下了宝雨那样希奇，在短暂的时间里，却土的权威也就大起来了。他受魔力的牵引，心情也就骄横起来。他对于佛教，特别是对于宗喀巴大师的教法，生起邪见和怒恨，而恶意破坏。因此，丹津曲吉杰波王也就从一心敬奉佛教的本土发动了大军，于丁丑年正月开到措喀地方，好比那具力王罗玛那歼灭罗刹楞伽主那样，一战之下，他将却土的四万大军完全歼灭而无余。于是，东至措喀的边境，完全收归在自己的管辖之下，而以政教相辅的策略来治理所辖民众，使其获得安乐。他渐次来到藏中，成办那能增长广大福德资粮的喜庆盛会。在西藏的金刚宝座——拉萨神变寺中，他接受了诸侯之冠，能使众生获得安息的大法王称号与职位。继后他转道来到甘丹尊胜洲大寺。当晚虽是二十七日月黑天气，但在黄昏时分，发现极为白亮的暮色，能看见细小的砾石。这是符合政教事业，将成为洁白祥和的缘起征兆，并在那时又发现一些大西藏将归他统治的良好征象。在丑年冬季，因康区中部白利发生了对于佛教徒进行残害，而只许发展苯教的事件，所以他再次来到措喀。因此，他于己卯年五月发动大军到达白利，当即收服了那里的民众。在庚辰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所有白利顽强的官吏头人等，虽一度远遁他方，但他们难以抵抗那福威强大的铁钩，结果如磁石吸铁般地都被捕回，全数置于法庭，依法惩办。这样从区域中消除了一切痛苦不安的根源，将所有受害的萨迦、格鲁、住巴噶举、达隆噶举等各派僧官们从牢狱中解救出来，而送回他们各自的乡土。从此，包括降域王所辖的人民在内的所有民众都来献纳赋税方物，恭顺承事。继后他即对卫藏方面用兵……大法王丹津曲吉杰波发动了百万大军出征，遂将南方边境完全收归权下。在壬午年二月二十五日，所有西藏木门人家王臣全体都降低了骄横的气焰，俯首礼拜，而恭敬归顺。于是依《时轮》初年计时于三月望日，完成统一西藏事业，成为全藏三区之王。法令所及，犹如神圣白伞大有掩蔽天界的气势。大法王他对于佛教的任何宗派，都一视同仁，虔诚敬重。但是由于噶举派的执政人们作风不良，而引起对东部工布地区用兵进剿。……

其它藏文史籍如松巴堪布益西班觉的《青海史》、智贡巴·贡却丹白绕杰的《安多政教史》以及阿旺丹白坚赞著《政教史明晶鉴》等书也都有有关这段史事的大同小异的零星记载，已为研究者们所识。另外，卫拉特蒙文文献中也有一些有关此事的记载，如特克第著托忒文文献《蒙古溯源史》中说：

唐古特的红教势力猖獗，将四个黄教寺庙的僧侣赶跑了。以班禅额尔德尼和达赖喇嘛为首的哲蚌寺全体护法喇嘛对安萨呼图克图说："你去合适。东方有个卫拉特地区，那里有恢弘宗喀巴的黄教的缘份，你去动员他们的汗，把黄教恢复起来。"安萨呼图克图在卫拉特汗的大会上声称："我就是专程到卫拉特来的。"诸汗商定派遣三万军队，安萨呼图克图非常满意。诸汗十分敬重安萨呼图克图，向他敬献了大批供物……

三万部队列成尖阵出发，顾实汗、巴图尔珲台吉、墨尔根济农、松古尔扎布巴图尔台吉等四人打败了红教在安多地区的罗卜藏却土汗、卫地区的白利汗、藏地区的藏巴汗等三人。于是顾实诺门汗即位，打败了红教势力，弘扬了宗喀巴的圣洁的黄教，向班禅额尔德尼上号如山之高僧"博克多"，向达赖喇嘛上号如海之大师"达赖喇嘛"，嘱咐道："你们二人要带领众呼图克图弘扬圣洁的黄教。"……于是，顾实诺门汗登上了西藏的汗位。

《卫拉特纪事》上也有类似的记载。

由上可知，蒙、藏文文献中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一方面过于笼统，另一方面又因后人追述，

错讹、漏洞百出，且彼此相异，给科学地研究和认识这段历史造成很大困难。从目前研究情况来说，在基本历史框架大体弄清的前提下，仍有如下一些问题尚须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

1、格鲁派集团派往卫拉特的使者是谁

前引《蒙古溯源史》等托忒文文献认为派往卫拉特的使者是安萨呼图克图，而藏文文献《青海史》中则认为是青海大衮隆寺僧人嘎如那钦译师和申尼卡切二人，并且说他们还参加了这一决策活动。在决定派他们去卫拉特后，“彼等回到本乡，带领少数英雄部之友军出发，抵达准噶尔”。东嘎·洛桑赤列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中也认为派往卫拉特的使者是申尼卡切和嘎如那钦译师，但他认为达赖五世的强佐索南绕丹和第巴吉雪巴·措杰多吉派哲蚌寺桑洛康村的几名僧人捎密信给嘎如那钦译师和申尼卡切，让他们化装通过青海前往卫拉特部，请求顾实汗出兵救援。《五世达赖自传》中在谈到噶举派红帽绕降巴与却土汗父子密议协力消除格鲁派、并已派阿尔斯朗率军到达藏北之情况时，说当时格鲁派内人心慌乱，达赖自己也去向帕帮卡活佛卦问吉凶，并且说“从此与蒙古往来渐密”[10]。这很可能就是指他派人去卫拉特之事，但在自传中未见其详，更没有提及“与蒙古往来”的人是谁。从各方面情况来看，派往卫拉特的使者是青海僧人嘎如那钦和申尼卡切的看法比较可靠，而蒙文文献中的安萨呼图克图也许是此二人中一人的法号。

2、是谁派使者向卫拉特借兵的

《青海史》认为作这一决策的是五世达赖强佐索朗绕丹、吉雪第巴·措杰多吉以及青海大衮隆寺僧人嘎如那钦和申尼卡切四人，而卫拉特蒙古文献中则认为是班禅博克多和哲蚌寺护法喇嘛们等。由于当时五世达赖年幼，格鲁派集团中威望最高的是班禅洛桑曲吉坚赞，而负责管理格鲁派集团日常事务的则是强佐索南绕丹，使其二人成为当时格鲁派集团的中坚人物。因此，近世许多学者也认为“黄教的首脑人物罗桑却吉坚赞和达赖的第巴索南绕丹等设计，一方面重贿阿尔斯兰，以缓燃眉之急，另一方面派人求助于和硕特部固始汗”[11]。

从史实上看，十七世纪以来第悉藏巴势力与哲蚌、色拉等格鲁派寺院及第巴吉雪之间屡有争端、冲突，1618 年一战中格鲁派及吉雪第巴方面惨败，哲蚌等寺被藏巴第悉势力肆意毁坏，还被迫向藏巴第悉缴纳大量罚金，身为协俄的索南绕丹设计逃往蒙古地区，向土默特大小拉尊请兵攻打第悉藏巴，收回前已失去的土地和寺院等。此时，第巴吉雪巴一方面作为哲蚌、色拉等格鲁派寺院的主要施主，另一方面又作为一方世俗势力，不服第悉藏巴之势力，而积极参与了这些争端。因此，索南绕丹与第巴吉雪巴的联盟是显而易见的。继后，却土汗消灭土默特部，察哈尔人、却土汗、白利土司等阻断汉藏黄金桥，使格鲁派形势急转直下之时，“一些有胆识的僧人绕道内地，经打箭炉转中康地区前往卫地”[12]，“安多大衮隆寺僧人嘎如那钦译师和名叫申尼卡切的这两位有胆识者亦来到西藏”[13]。很显然，强佐索南绕丹等就是从这些“有胆识的人”那里找到了新的希望，即向笃信黄教的卫拉特求救。从后来的情况看，顾实汗在消灭白利土司后派人向达赖喇嘛请安报捷时，强佐索南绕丹背着达赖喇嘛请顾实汗领兵入藏，等顾实汗军抵达藏北达木时，才向达赖喇嘛予以说明，并且在达赖喇嘛仍欲劝令该军退回青海的情况下，极尽所能地劝解达赖喇嘛“无论对藏巴第悉王臣言及何事，彼等皆不屑一顾，且疑虑重重。而我方人员皆言，甘丹颇章首脑‘亲后藏’。”并且说：“如果此次依靠王的大恩大德能从藏巴第悉治下解脱出来，就解脱了，否则再无解脱之日。”[14]使达赖喇嘛收回劝令蒙古军退回青海的想法。同时，他还派人到前后藏区四处动员、大量征集士兵，并令达尔东知宾引领蒙古军队进攻藏巴汗，[15]大有与藏巴汗誓不两立之势。由此看来，强佐索南绕丹作为格鲁派集团向卫拉特请

兵的重要决策人物无疑，有些史家甚至认为五世达赖喇嘛得以建立统治全藏的甘丹颇章政权，全归功于顾实汗和强佐索南绕丹二人的英勇无敌之举[16]。

《安多政教史》上记载说，消灭却土汗以后，"顾实汗及其随从、吉雪第巴义雄等前去卫地"，五世达赖喇嘛也说"顾实汗、卓尼曲吉、萨迥妥归南杰叔侄等两千余人到达拉萨"[17]。顾实汗拜见达赖喇嘛等准备返回青海之时，"第巴吉雪巴叔侄二人担心不能收回全部领地而疑虑重重，又指望藏巴汗赐一领地等，犹疑不决，使协俄非常为难"[18]。次年，顾实汗派墨尔根噶纠西绕嘉措等人来迎请达赖喇嘛去青海时，又"召集众协俄于拉萨，商讨有关第巴吉雪巴的问题"[19]，即第巴吉雪巴臣属藏巴汗与臣属顾实汗的利害问题。在顾实汗消灭白利土司，准备进攻藏巴汗时，为避免战争中的不测，曾请班禅洛桑曲吉坚赞来拉萨"会见二王后并向他们传法"[20]，班禅行至仁布时得藏巴汗旨返回日喀则之际，在联地方遇见"吉雪第巴称顾实汗的军队明日将抵白朗"[21]。从这些零零星星的记载来看，第巴吉雪巴并没有在向卫拉特借兵这一决策中起了什么积极的决定性作用，当然也没反对之，而只是作为一方势力犹疑不决、顺其自然地参与了格鲁派一方的活动。

蒙文文献中特别突出地指出当时力主向卫拉特请兵的是班禅博克多即四世班禅洛桑曲吉坚赞，而且许多藏史专家也持如是观[22]，但在藏文文献中却有与此不尽相同的记载。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弄明白，(1)虽然当时格鲁派中班禅洛桑曲吉坚赞无可怀疑地享有最高威望，但此时的班禅还仅仅是个班禅即大学者，而非后来意义上的班禅，即还没有建立班禅活佛系统；(2)他驻锡于藏巴汗所在地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与拉萨格鲁派集团的联系并非过密；(3)洛桑曲吉坚赞一心向善、潜心修佛，"对各教派一视同仁、不抱偏见"，从他学佛的各教派大大小小的僧人遍布卫藏各地，受到各派僧俗人众的极大崇敬。[23]因此，在十七世纪初以来战乱不休的西藏，无论是蒙藏之间、卫藏之间，抑或是格鲁派集团与敌对势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他总是被请去与达隆夏仲、萨迦法王等名僧望人一道去做调解人。从他的自传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对当时西藏那种各派之间纷争不休、争战不已的现实极为忿恨。在其即兴而作的众多道歌中，既反映了当时那种纷乱的现实，同时也对那些为一己利益所驱而荼毒生灵的僧俗权势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严厉的批评。从这些应时而作的道歌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并没有卷进当时格鲁派集团与藏巴汗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之中。当然，顾实汗在 1637 年进藏拜见达赖喇嘛时，也给班禅"赠银二千两"[24]，班禅为其念诵了平安吉祥经，但这并不能成为班禅力主向卫拉特借兵的证据。实际上，除了这一句赠银诵经的记载外，直到顾实汗准备进军藏巴汗之地之时，在述及与顾实汗的交往等事时从未有牵涉班禅的记载。即使是顾实汗在准备进军藏地前为避免不测而请班禅到拉萨时，也是以"王后年迈不能去日喀则"[25]为借口，班禅自己也是奉藏巴汗之命而急急赴往拉萨的[26]。班禅行至仁布时，因顾实汗的奸计为达隆夏仲信告藏巴汗，[27]藏巴汗便命班禅返回日喀则并令其准备在必要时与蒙古军斡旋。班禅到达日喀则时，蒙古军已经扎营该地，被骑兵百余人强行迎到蒙古营中。由于前此藏巴汗在札什伦布寺附近新建一所大寺院，并在札什伦布寺后山修筑墙碉，被一些人妄名之为札什斯农(意即威慑札什伦布寺)，因此，当时社会上出现一种舆论认为这些蒙古军是由班禅谋划请来的。对此，班禅自己曾赌咒说："此次到蒙古军中以前，从未与顾实汗和强佐索南绕丹之间有过有关此事的任何接触和来往。"[28]后来被请去在顾实汗和藏巴汗之间充当中间人进行调解时，与同请的萨迦夏仲商量好尽力为藏巴汗效力，但因顾实汗决心已下，无可奈何只保住了藏巴汗的命。[29]

从以上史实可见，四世班禅洛桑曲吉坚赞虽为当时格鲁派中很有威望的大德，但并没有卷

进格鲁派与藏巴汗之间的争斗中，更不是格鲁派集团中力主向卫拉特借兵的决策人物。

3、顾实汗应请出兵的原因

《青海史》、《水晶鉴》等藏、蒙文献都记载说，西藏使者禀明来意后，卫拉特方面欣然同意派兵，并且说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顾实汗。但在述及其所以然的原因或动机时，各种文献都模模糊糊地说是“一心为了圣教”[30]。倒是在噶旺沙喇布的《四卫拉特史》中，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记载：

> 以顾实汗、鄂尔勒克及其六子，巴图尔珲台吉、昆都仑乌巴什、车臣汗、阿巴赖、杜尔伯特托音为首的卫拉特大小诺颜议定，（我们）供奉达赖喇嘛吧！土伯特不是属于达赖喇嘛吗？卫拉特不要约束自己，到最想去的地方去吧！

这段记载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隐约地给我们提供了某种线索和启示。卫拉特早在1615年就接受了察汗诺门汗传播的黄教，而且各诺颜们都出一子当班弟，到藏区去求法学佛[31]。因此，西藏黄教受各方势力的打击压制时，卫拉特蒙古前去救援，完全在情理之中，没有什么出乎意料之处。顾实汗出兵青藏高原确实是要保护弘扬黄教，“凡于黄教有损害者，王必率众平之”[32]。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保护、弘扬黄教并不是其出兵青藏高原的根本原因或目的。

卫拉特西迁以后，由于人口、牲畜数量得到大量增长，对草场范围提出了一些新的更多的要求，从而与周边地区冲突不止，尤其是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卫拉特各部与喀尔喀蒙古及哈萨克诸部之间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同时，1625年由准噶尔引起的那场内乱“使卫拉特领地内的内部形势大大地复杂起来”[33]，造成各部之间的严重分裂。巴图尔珲台吉作了准噶尔部的首领以后，不断欺凌排挤其它各部，迫使和鄂尔勒克于1628年率部迁往伏尔加河下游地带。与顾实汗的关系也日趋紧张，“以致发生武装冲突”[34]。如此等等。在这样一种内乱外患之中，身为和硕特部首领的顾实汗为摆脱战乱不休的处境、谋求本部的生存和发展，自然会产生转移牧地、另寻出路的想法。西藏格鲁派寺院集团恰在此时派人向卫拉特求援，正好为其提供了有利时机。在如此天造地设、千载难逢的时机面前，卫拉特首领们发出“不要约束自己，到最想去的地方去吧！”的呼声是必然的。其实，顾实汗进军青藏高原得到原与其关系紧张的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支持、卫拉特联军进占青海后和硕特举部移牧于青海而巴图尔珲台吉则率领其部众班师新疆，都很明显地说明了卫拉特应请出兵青藏高原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4、顾实汗进藏拜会达赖喇嘛的时间

蒙、藏一些文献中记载说，顾实汗在答应黄教僧人所请后，为慎重起见，先化装成香客前去西藏进行考察了解。蒙文本《水晶鉴》载：“是时卫拉特和硕特部的大诺颜名图鲁拜琥，号顾实汗者，化装成朝圣的香客，带领十人，来到召地，进行会商而归。”松巴堪布《青海史》也提到此事，并明确指出是在木猪年（1635），顾实汗一行去往西藏途中遇见率军进藏的阿尔斯郎，“遂同路而行”。是故，很多学者都认为顾实汗一行此次顺利到达拉萨，会见了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及四世班禅洛桑曲吉坚赞等，互赠名号，并议定包括顾实汗进兵青海消灭却土汗等在内的有关事宜[35]。但查《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等可靠的藏文史籍记载，阿尔斯郎于1635年秋冬之季率军到达西藏，而顾实汗进藏拜见达赖喇嘛等则是在火牛年即1637年秋天。[36]

从藏文文献记载来看，顾实汗于火牛年即1637年正月，以一万军队灭却土汗三万军队，占领了青海[37]。这点也可与俄文史料中的有关记载互为印证。据俄文史料记载，俄国那札尔·札多夫斯基曾在雅敏河（额敏河）之地找到了顾实汗的兀鲁思，但没有见到汗本人，因为他在1636年秋率师作战去了。1636年9月从托博尔斯克派到巴图尔珲台吉处的一位使者也报道

说他到巴图尔珲台吉那里的时候，珲台吉等台吉们都向蒙古作战去了。后来他听到了粉碎绰克图台吉四万军队，杀死绰克图台吉本人的消息[38]。

很显然，顾实汗在1635年并没有进藏。顾实汗等人于1635年化装成香客从卫拉特地区出发，前往西藏，是“去了解先前使者所说是否确切”，在途中遇见阿尔斯郎军队，同路而行，得知阿尔斯郎是其父却土汗受红帽绕降巴之请派往卫藏地区去迫害诸格鲁派上师及捣毁寺院、僧房、修道处的[39]。至此，顾实汗用不着再去西藏便已经知道黄教处境的危险，于是“顾实汗向阿尔斯郎讲了很多关于不宜危害黄教的理由”[40]，在通天河上游分手后，阿尔斯郎继之前往西藏而顾实汗则“循原路返回和硕特本部”[41]，抓紧准备远征青海，消灭格鲁派最为危险的敌人却土汗。在歼灭却土汗、进占青海后，才“渐次来到藏中”，[42]拜见了达赖喇嘛等格鲁派显要人物。

---

①《历辈噶玛巴传略如意宝树》(藏文)，见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合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8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伍昆明著《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第28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⑯阿旺丹白坚赞著《政教史明晶鉴》(藏文)，《西藏史籍五部》第272页，280页，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④⑥⑫智贡巴·贡却丹巴绕杰著《安多政教史》(藏文)第31页，31页，32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

⑤⑧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著《西藏王臣史》(藏文)，第192页，193页，民族出版社，1957年版。

⑦⑨《安多政教史》(藏文)第32页；《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藏文·上)第158页，15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⑩⑭⑮⑰⑱⑲㉕㉗《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藏文·上)第159页，201页，202—203页，169页，171页，179页，201页，202页。

⑪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第一版。

⑬㊴㊵㊶松巴·益西班觉著《青海史梵曲妙音》，见黄颢译注本，载《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三期。

⑳㉑㉓㉔㉖㉘㉙《四世班禅自传》(藏文)第200页，200页，126页，190页，200页，201页，20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㉒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98页。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班禅额尔德尼传》第3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㉚《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藏文)第168页，《安多政教史》(藏文)第32页；《西藏王臣史》(藏文)第192页；托忒文文献《蒙古溯源史》等上也有类似说法。

㉛《咱牙班第达传》，成崇德译，见《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第4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

㉜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卷5。

㉝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149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㉞加班沙拉勃《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转引自《准噶尔汗国史》第172页。

㉟王辅仁、陈庆英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第113—1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第35—36页。

㊱《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藏文)第169页，《四世班禅自传》(藏文)第190页。

㊲《安多政教史》(藏文)第32页，《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藏文)第168页，《西藏王臣史》(藏文)第192—193页，《青海史》黄颢译注本等。

㊳若松宽《俄文史料中所见到的顾实汗事迹》(日文)，转引自乌云毕力格《和硕特汗廷的建立过程》，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四期。

(作者罗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硕士研究生　　邮编100872)